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

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

(增订版)

田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

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

(增订版)

田 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田野著. —增订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ISBN 978-7-208-14878-9

I. ①国… II. ①田…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8691 号

责任编辑 史桢菁 潘丹榕

封面设计 晓阳工作室

·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
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
——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
(增订版)

田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0 插页 4 字数 281,000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878-9/D · 3133

定价 65.00 元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 编：冯绍雷 陈 昕

编 委：王逸舟 王缉思 冯绍雷

李敏煮 陈 昕 秦亚青

黄仁伟

丛书总序

走向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以其前所未有的成就,期盼着、静候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來。

人类从未有过如此辉煌的业绩,也从未面临过如此艰难的选择。

当下之时,人们刚刚庆幸于和平地实现了国际格局的大转换,却又忧心忡忡于帝国崩溃之后的动荡与纷乱;旧有观念系统被冲击后的迷惘与困惑,以及未被摧毁的武力所带来的疑虑与恐惧。人们在欢呼史无前例的繁荣进步之余,还不得不为已经显露、或尚被隐匿的种种不测之虞所困扰:国际交往迅速增加之后所伴生的失控;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同时引发的失却平衡;科技昌盛之后所出现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破坏;尤其是新一轮大国竞争所酝酿的国际社会的重大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对这个因循沿袭和重新构建中的国际政治秩序提出巨大的挑战。

恰恰是这种变动与期盼、困境与挑战,渴望着——门能够对当前国际变化指点迷津的成熟的知识门类应运而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专门研究国家间交往规则与方式、国际结构要素与机制及其变化规律与逻辑的国际政治学科,不仅无由推却自己的历史责任,而且必须以自身所持有的知识工具,为新世纪的降临催产。

传统的国际政治学科曾有丰厚的积累。这一知识领域对世界体系、国家主权、民族观念、冲突合作、地缘政治,以及交往机制与结构性问题有着诸多理论思考与详尽的实证记载。问题在于,当今的国际变迁已经大大超出这一传统知识门类所能容纳的范围。

当今,人们已远远不满足于对国际事务简单的、或者哪怕是详尽的记录式描述,而往往要求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从描述方式向理论分析方式的转化,已经是客观的国际现实的耳提面命。人们也往往不

满足于仅仅或从政治，或从经济，或从军事的单一学科的国际现象分析，国际事务本身早已经跨出了学科的阇域。所以，从单一学科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心理、历史乃至包括各门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已经是学科本身的逻辑发展所使然。恐怕，一个更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人们还往往不满足于从国际政治与国内问题相互割裂的眼光来看问题，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已经把各国国内的变迁与国际交往与世界性事务紧密相连。因此，从国际与国内相互关联的角度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水平，潮流的变迁，甚至于世风的转换，无论对于学科建设，还是对于战略选择与政策判断来说，都是一个格外重要，也格外需要重视的方面。

在海外，面对新世纪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已经向世人交出了他们的答卷。近年来，蜚声欧美的保罗·肯尼迪、布热津斯基、塞繆尔·亨廷顿，包括基辛格等，已经写出了多部长篇巨著，直面国际巨变，预言天下走势。虽然，这样的一类著述不会也不可能给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但是，国外同行世纪末的冲刺，无论如何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信号：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将如何回答既是来自客观研究对象的、也是来自同行同代人的挑战？

所幸者，国际问题学术研究领域已经不大可能再是欧美国家的一言堂了。生存与发展、一体化的挑战以及出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一步一个脚印地营建着自身独特的国际政治知识结构。

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远不容易。中国国际问题学者首当其冲的任务，恐怕是要寻找和形成国际政治专门领域的研究语言与研究规模，并克服模棱两可、大而化之表述的障碍。因为主观臆测、缺乏实证基础的做法，曾经给我们的国际研究与重大问题的判断带来干扰与破坏。

与此同时，构筑国际政治领域独特的概念与范畴体系，也是需学者们皓首穷经，冥思苦寻方能实现的境界。对于一个思辨逻辑传统相对薄弱的民族，这无疑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观念革命。事情恰恰在于，一个没有独特范畴与概念体系的专业门类，就没有权利去担当反映和影响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角色。

从客观上说，与工业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阶段的国际环境相比，当

初,西方列强是在一个积贫积弱的环境中以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科技文明开拓新边疆的;而今,当发展中国家起而奋争时,举目四望,国际环境中却早已是强手林立。这样的国际环境反差,也决定了两种国情与国际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研究将会在研究的主题、方法、素材等许多方面大相径庭。这也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必得对当今国际问题作出自己回答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所在。

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立意于回应国际社会走向新世纪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并出于构建中国背景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长远考虑,延请国内一流的国际政治学者,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国际政治学术著作,以飨海内外的同行与读者。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编委会

1995.5

重版代序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回顾与思考^{*}

田野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首先在西方兴起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理查德·库珀、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等个别经济学家为这一新兴学术领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仍首先归功于政治学家的贡献。从学科形成起,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成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下发展的一个次级学科。

学术文献是学科发展最主要的体现。尽管社会科学文献特别是经济学文献越来越多地采取了论文的形式,但是在国际政治学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文献还是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这些著作不仅构成了国际政治学专业教学的基本参考文献,也为国际政治学研究者之间的相互沟通提供了共同知识背景。本文将将近十几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作为基础回顾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揭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初步呈现的特质,展现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并探讨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未来取得更大知识进步的空间。

^{*} 感谢宋新宁教授、王正毅教授和李巍副教授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刘毅博士对本文思路的形成也有一定的贡献,在此一并致谢。本文的最初版本曾以访谈录的形式发表于《国际政治研究》2016 年第 1 期,此次收录于本书时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与补充。

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在改革开放以来新一轮“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国际政治经济学随着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20世纪80年代，倪世雄、桑玉成、陈德照、刘同舜等先生陆续发文介绍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些文献，布鲁诺·弗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也被翻译为中文出版。不过，在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尚未展开的大环境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当时的中国也只能处在萌芽阶段。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在中国的全面展开，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真正迈入起步阶段。在1991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宋新宁提交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挑战、困境、出路》的长篇论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主要课题和未来设想在中文世界中第一次进行了全景式的勾勒。¹在90年代，宋新宁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组织了为期八年的中美暑期讲习班（1990—1997），斯蒂芬·克拉斯纳、约翰·奥德尔、邓肯·斯奈德尔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大牌学者都曾在这个讲习班上授课。当时尚在南开大学任教的王正毅则与美国的迈尔斯·卡勒等学者联合组织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亚太区域化”国际合作项目（1995—2000），在五年的项目期内共举办了三次国际会议和两次国际研讨班。这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不仅促进了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而且为中国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人才培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作为学科知识体系化的反映，三部代表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或者具有教科书功能的基础理论性著作在世纪之交相继出版。作为国内第一部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宋新宁和陈岳合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于1999年出版²。紧随其后，樊勇明于2001年出版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书³，王正毅与张岩贵于2003年出版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⁴。通过划定学科边界、归纳理论谱系和展开经验分析，这三部教科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

研究的规范化、体系化。这些书在初版后不仅多次印刷,而且以不同方式都出了再版或新版本,就反映了它们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从上述历程上看,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谱系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尽管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厚传统,而且这一传统对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学科体系的构建上看仍对接于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当然,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也包含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实际上,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能够被系统介绍到中国,和这几位学科的创立者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留学或访学经历直接相关。比如,宋新宁在1991—1992年到伦敦经济学院访学期间系统学习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回国后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1995—1996年,他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赴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镇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访学,回国后就着手《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写作。王正毅于1994—1995年赴纽约州立大学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在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系统学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并在回国后完成了相关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的撰写。樊勇明则自1992年起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访学并攻读博士学位,并在回到母校复旦大学后主持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由于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才形成,走出国门的中国学者可以很快地掌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谱系与发展动态,在起点上就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界的对接;而三部代表性教科书所确立的学科体系也相对稳定,从而为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知识基础。

由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肇源于西方,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演进也会影响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发展阶段,为了将国际关系的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重新结合起来,吉尔平等开拓者们回归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传统,即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了新重商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宏观范式。作为当时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种主要趋势,国际关系理论家也致力于构建国际

体系层次上的理论范式，这也不可避免地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开拓者集中探索国际体系层次上的政治经济互动。但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对学科的基本范畴与研究路径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共识，思想传统之间的辩论已经不再是驱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经过多年的学科专业化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更多地是在不同的问题驱动下采用更为定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展开更为具体的中层理论构建和经验实证研究。此外，随着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两个学科的日益融合，也随着这一时期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各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显著提高，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日益将其分析层次回落到国内体系中，积极探索开放条件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互动。由此，“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 OEP)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在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几乎有“一统天下”之势。本杰明·科恩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上述转变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分为第一代学者和第二代学者⁵，而基欧汉则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两种范式分别称为“旧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新国际政治经济学”⁶。那么，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是否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也有所体现呢？

如前所述，世纪之交出版的三部教科书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形成确立了基础和框架。这三部教科书尽管各具特色，比如宋新宁和陈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更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价值，王正毅和张岩贵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则突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代理论的影响，而樊勇明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则凸显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衔接，但是它们在以下这一点上都是共同的，即深受吉尔平关于三大思想传统划分的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无论是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溯源还是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流派划分都采用了“三分法”，即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分为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则在系统介绍古典重商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三种古典理论之后，将当代国际政治

经济学理论分为沿袭古典重商主义传统的霸权稳定理论和国家主义理论、沿袭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相互依存理论及沿袭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更直接地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为“相互依存论和新自由主义”“霸权稳定论和新现实主义”“依附论和新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上述结构安排上体现出了吉尔平式的思想传统划分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深刻痕迹。

在这种学科体系下,中国学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深受这种划分的影响,以某种理论流派的视角来分析国际体系层面的政治经济互动。在新千年的起点上,《国际体系研究:历史与现状》运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国际体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⁷《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则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文献深入讨论了国际制度的形式选择问题。⁸《中国石油安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依据新自由主义理论提出处理好业已存在的中国与国际石油市场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才是保障未来中国石油安全的上策。⁹《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提出了一种国际制度形式选择的交易成本模型。¹⁰这些著作不管采用何种视角,都主要着眼于国际体系层次的分析。

进入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下半期后,中国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开放经济政治学在美国取得的进展。在与美国同行交流的基础上,王正毅在 2006 年提出了“超越‘吉尔平式’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他详细介绍了美国新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有关国际政治经济与国内政治互动的最新成果,归纳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特征,阐述了“后吉尔平时代”的研究议程。¹¹曲博在 2006 年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上,介绍了开放经济政治学兴起的背景和具体的研究纲领。¹²此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更多地迈向了聚焦于国际—国内互动的道路。

这种范式的转换反映在代表性教科书的再版上。比如王正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在理论演进部分开辟专章来介绍“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如何立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分析对外经济政策,而且对国际金融、国际贸易、跨国公司、发展与转型等经验议题的政治

经济分析都体现了“后吉尔平时代”的特点。¹³宋新宁和我合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二版)则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为“国际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国际—国内互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分章叙述。¹⁴与该书第一版相比,该书第二版在国际贸易、国际货币金融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分析中,也突出了国内政治对国际贸易、货币金融与投资的影响。此外,朱文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版)颇具特色地从比较经济体制的视角讨论了国家间的竞争¹⁵,邝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因素分析》(第二版)则强调了一定国内制度下利益集团和政党在各国对外贸易与金融政策选择中的作用¹⁶。

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2006年以后出版的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也反映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对国际—国内互动的关注。《权力与经济增长》从多层次博弈的视角分析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¹⁷《中美经贸关系》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三维”分析框架下聚焦于中美两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¹⁸基于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的关系,《平衡社会利益与国家安全——政府对外贸易战略选择》发展了国家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理论模型。¹⁹《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提出美国国内制度结构的变迁导致了国际体系和国内社会信息传递渠道的变化,从而促成了国际经济政策的调整。²⁰《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博弈论建立了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解释模型。²¹根据“后吉尔平时代”的研究议程,《管控投资自由化:美国应对日本直接投资的挑战》探讨了美国为什么以及如何管理流入本国的日本直接投资。²²《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在结构性权力的视角下探讨了跨国公司与母国、东道国之间的关系。²³《危机下的抉择:国内政治与汇率制度选择》提出了国内政治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分析框架,并以此解释了韩国和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汇率制度选择。²⁴《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探讨了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对大国技术创新的影响。²⁵《国家的选择:国际制度、国内政治与国家自主性》探讨了国际经济制度对国内政治中的国家自主性的影响。²⁶这些著作多数采取了从国内到国际的视角,不过也有著作采取了从国际到国内的视角。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特质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了与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大致相同的发展轨迹,即从聚焦于国际体系的研究转向国际—国内互动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开放经济政治学之路。根据戴维·莱克在《牛津政治经济学手册》中的界定,“开放经济政治学将企业、部门或生产要素作为分析单位,从每个单位在国际经济中的位置来推导它们的经济政策偏好,并将制度看作利益聚合的机制和竞争性社会利益集团议价的条件,最后探讨具有不同社会利益的国家之间在国际层次上必要的议价”。²⁷ 简单地说,开放经济政治学研究的第一步是将世界经济作为自变量,国内行为体的偏好作为因变量,第二步是将国内政治中的偏好或制度作为自变量,对外经济政策作为因变量,第三步是分析这些具有不同政策倾向的国家之间的博弈。2006年以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尽管聚焦于国际—国内互动,但并不都是严格按照莱克的界定来探索国际—国内互动的。实际上,开放经济政治学一词在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同行之间也没有流行开来。

有意思的是,当国际—国内互动研究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开始占据主流时,开放经济政治学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开始遭受很大的质疑和批判。由于过多地追求演绎的精确性以及系统的实证数据,开放经济政治学对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不够敏感。基欧汉在肯定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成就时也坦率指出了这一不足,主张面对各种新问题需要采用更加多元的方法,包括与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学术旨趣相当不同的英国学派。实际上,由苏珊·斯特兰奇所开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英国学派本身在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上就更为多元和开放。²⁸ 斯特兰奇所倡导的“开放的领域”被英国学派的很多人所响应,从而使其能够将世界上发生的各种新变化纳入其研究问题的清单。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国学派对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及时讨论彰显了这一学派的活力。

即使没有有意识地呼应西方学者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反思,中国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也没有完全落入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窠臼。中国学者在积极推动国际—国内互动研究的同时，并没有像开放经济政治学那样忽视国际政治的结构与进程，而且也没有像开放经济政治学那样忽视国家面对社会时所具有的自主性。

首先，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在国际—国内互动的研究中并没有忽视国际政治的结构与进程。尽管开放经济政治学在最后一步纳入国际议价的因素，但在前两步都以隔离国际政治进程的方式来集中探讨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根源。尽管一些政策选择是纯粹国内政治的产物，但其他的一些政策选择是国内和国际进程互动的结果。在后一种情况下，忽视国际政治将会导致研究者基于国内政治而产生推理过程中的偏见，托马斯·奥特利将其称为“还原主义的赌博”。²⁹就此而言，重温“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也许是有益的，当然需要对其加以一定的改造。因此，无论是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互动，还是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互动，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

就近年来国际—国内互动研究的践行者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而言，王正毅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国际因素的研究、张建新对国际能源体系的研究、王勇对中美贸易关系的研究、宋国友对中美金融关系的研究、李巍对中国货币外交的研究、钟飞腾对中国周边关系的研究、保建云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黄河对国际经济规则的研究、曲博对全球经济治理和黄琪轩对大国权力转移的研究，以及我对国际经济制度的研究，都表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在从事国际—国内互动研究中虽然“找回”了国内政治，但没有“踢出”国际政治。这种对国际政治结构与进程的格外“珍重”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强调国际—国内互动的同时形成不同于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特点。

李巍在这方面作出了比较多的理论化工作。其《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崛起》在汲取作为“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霸权稳定理论的学术养料的同时对其进行了重大的补足，突出了国际政治领导对国际货币秩序缔造的建设性作用。³⁰在新近的研究中，他主张通过整合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有用内核来同时强调国际制度的公共服务功能和私人权力功能，从而提出了现实制度主义。³¹基于国际制度的双重属性，李巍认为国际制度竞争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特别是大国间竞争的

重要表现形式。一方面,国际制度竞争是制度主导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另一方面,国际制度竞争也是主导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竞争。

此外,在我本人关于国际制度与国家自主性的相关研究中,作为国际政治体系一部分的国际制度是自变量,国内政治中的国家自主性是因变量。³²这一点不同于开放经济政治学将世界经济作为第一步研究中自变量的通例,也不同于其将国内政治作为第二步研究中自变量的通例。

其次,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在国际—国内互动的研究中并没有忽视国家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尽管开放经济政治学将国内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纳入到分析框架中,其分析的起点仍首先是社会行为体的偏好,因此具有社会中心论的倾向。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之初国家主义理论的重要位置相比,开放经济政治学的这种倾向可以说是某种“倒退”。与西方政治体系中“国家弱、社会强”的国内结构不同,中国政治体系中“国家强、社会弱”,与中国具有类似国内结构的某些东亚发展型国家也是如此。鉴于这种差异的显著性,即使是对国内政治体系的分析,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也呈现出了与开放经济政治学不同的特点,即突出了国家或政府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

一般认为,固定汇率制是国家控制经济的手段,而资本自由流动是世界市场扩张的结果,但东亚新兴经济体却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组合。曲博在对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的探讨中发现了将基于西方民主国家经验的对外经济政策模型应用于东亚国家的局限性,从而提出了东亚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修正模型。³³在这个模型中,他强调社会行为体的选择与分化并不依赖要素的流动性,因为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是由国家的发展战略所确定的。曲博对东亚经济体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显示,政府可以利用掌握的国内政治权力来主动应对全球经济的挑战。

另外,世界市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经不再是自发的市场,而是由制度调节的市场。那么,作为世界市场组织化反映的国际经济制度是限制还是增强了国家自主性?我本人提出了国际制度增强国家自主性的理论。³⁴这一理论的主要因果机制包括:第一,国际制度可以重新分配国内政治行为体之间的权力资源,使国家行为体的偏好更

容易得到实现；第二，国家行为体可以通过国际制度使其当下推动的政策具有不可逆性，从而向非国家行为体作出可信的承诺；第三，国际制度有助于国家行为体推动与自己偏好一致的国内集体行动。这样，国际制度改变了国内政治博弈的既有均衡，在这个新均衡中国家所推动的公共政策将与自己的偏好更一致。因此，国家行为体可以运用国际制度来增强对国内其他行为体的相对自主性。

这些研究表明，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国内结构等国家主义理论的概念仍然有其生命力和适用性，尽管需要对其改造以增强其微观基础。也许，曲博和我的上述理论可以被称为“社会联盟的国家理论”和“国际制度的国家理论”，如果要为这些理论贴上标签的话。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开放经济政治学在以上两个方面的差异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体系和国内体系中的主要“特质”，即在国际体系中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在国内体系中中国是国家主导性的结构。因此，开放经济政治学在中国的扩散并没有带来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对其的趋同，而是使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实现范式转换的同时开始初步展现出自己的特点。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贡献

一般而言，国际关系研究至少可以分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部分。在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安全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地位几乎不分伯仲。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没有达到该学科在美国那样高的地位，但对中国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贡献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国际政治经济学将国际经济关系纳入国际关系学科的范围，从而拓展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对象。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体系在战后初期形成后，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兴起就打破了作为“高政治”的国际安全领域和作为“低政治”的国际经济领